

百年前的“童车”火柴商标官司

掌故

仇柏年

在阿拉宁波，正大火柴厂可谓家喻户晓；在国内，正大厂也有一定知名度，而且至今仍有影响。“创办于1907年的宁波正大火柴厂，五年内两度宣布倒闭。1913年后，该厂由在日本逗留多年、经办过多种行业、商业经验丰富的徐蕙生开办，逐步走上正轨……”百年老厂跌宕起伏的故事，被选入高考历史题。

正大火柴厂有许多故事，1925年的童车商标官司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该厂开办初期，使用鼎牌、钟牌、鼓牌等牌号。牌号是老底子对商标的称呼。徐蕙生接管成立正大新公司后，看到当时国内外火柴生产企业大多采用多商标经营策略，如日商燧生火柴公司注册有17个牌号；瑞典火柴业借用“民光火柴公司”名义，注册有27个牌号，还以“永固品公司”名义，注册了12个牌号；上海英昌厂也有20多个牌号。见过世面的徐蕙生意识到商标这一无形资产的价值，也不甘落后，相继推出不同牌号火柴。1923年5月，北洋政府颁布商标法及实施细则后，正大厂不失时机进行商标注册登记，如1925年1月注册童车商标，1928年11月注册爱鹤、泰山商标，1932年注册了20多个牌号。从已发现的正大火柴商标统计，数量超过20种，除了上面说到的，另外还有龙凤、嘉庆、美兔、宁波、浙江、民国、

学生、采桑、中山、爱国、童蝶、嫦娥、扑蝶、飞熊、教五子、小童车等。

在正大公司的众多商标中，最为著名的是童车商标。此商标实际使用始于1918年3月，1925年1月注册获准领证，专用期限20年。就因为这一商标，日商燧生火柴公司与正大火柴公司，于当年12月在商标局对簿公堂。

燧生公司代理人是日本人中根斋，正大公司代表人为徐礼茹（即徐蕙生，礼茹是其号）。中根斋认为正大公司的童车商标，仿冒了燧生公司自行车商标，他提出如下理由：

一、童车商标与自行车商标图案，尤其是其中重要部分——自行车，几乎相同。燧生自行车商标正中为一前大轮、后小轮的自行车，正大童车商标同样如此，只不过，仅为车上骑有一童子。

二、商标形状均为纵长方形。

三、商标图案中所绘条带形式及两角花纹亦完全相同。

据此，中根斋认为正大公司有意仿冒。他代表日方公司称：燧生自行车商标使用已近20年，为世所共知，一旦被人仿冒，利害关系甚巨，必须依商标法，对正大童车商标修改并限制。

正大公司代表徐蕙生辩驳如下：

童车商标与自行车商标的名称、性质、形状各不相同。

从名称上说，童车商标是以童子为主体，自行车商标则以车辆为目标，两者截然不同。而且商标之下各置公司之名，有显著区别，怎能说是仿冒？

从性质上说，童车商标图样为一童子骑车，其小轮距离车身较远，如疾驶状；而自行车商标图样为一庞然大物、单纯的自行车，其小轮钢条与大轮边缘衔接。两者一为努力前进，一为蠢然不动，说其近似，有谁能相信？

从形状上说，童车商标全图上部绘一黑衣童子乘车，中部为童子黄袴脚踏车轮，且轮身较小，其纵横钢条仅28条；自行车商标全图只绘一辆自行车，上端显露车座摇手，其大轮纵横钢条有41条之多。两相比较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另外，商标图案中上面的条带，童车商标译安全火柴英文字样，两端拖条为长尖形，而自行车商标两端为长圆形；下面的条带，童车商标为黑质黄字书正大新公司华文，而自行车商标为红地黑字书燧生火柴公司华文。两者区别明显。

徐蕙生还对日方提出的“形状均为纵长方形”诉由，予以反驳：至于商标为纵长方形，是一般火柴所通用，毫无限制之理。

理直气壮的徐蕙生，认为对方毫无理由，要求商标局对日方提出的童车商标修改并限制的诉求，予以驳斥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北洋政府商标局却作出如下认定：两商标均为纵长方形；其正中均绘小轮自行车一辆；上下所附条带形式和上方两角花纹，均相近似；所不同者是在自行车上有无童子。就大体观察，不能不认为近似。商标局还判定：从实际使用时间的证明看，童车商标始于民国七年（1918年）3月，自行车商标始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3月，自行车商标使用在先。依商标法第四

条之规定，判决童车商标修改图案。这个判决显然很不公平。

首先，从商标图案上说，两者虽有相似之处，但区别明显，不足以导致商品混淆。

其次，商标的实际使用时间，日方提供了虚假证明，而商标局未能鉴别出真伪。笔者查文献得知，燧生公司由日本东洋磷寸株式会社创办于1920年8月，这有《申报》1920年上海英昌火柴公司广告中“不料近有某某鼓动日商在附近之吴家花园，改建燧生火柴公司，现正积极进行”为证。燧生公司1921年开办镇江燧生厂，1923年开办上海燧生厂。所以，说燧生公司自行车商标始于1906年，完全是子虚乌有。

如果认定童车商标与自行车商标图案相似，按使用在先原则，该做修改的应是燧生公司，而不是正大公司。

发生商标纠纷这一年，正是“五卅”惨案发生之年，全国民众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罪行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，爱国热情高涨，而北洋政府商标局居然作出如此混淆是非的判定，令人匪夷所思。

燧生公司虽然赢了商标官司，却因各商店拒销日商火柴而发生亏损，最终于1928年闭歇，同年6月被瑞典火柴公司以63万元收购。

正大公司凭借民众抵制日货运动的有利条件，生产经营取得了长足发展。当年浙海关洋贸易统计报告书记载：“本埠正大火柴公司本年获利颇丰，所制之火柴半供本埠之用，半运温州福州两埠销售，而日本火柴则完全绝迹于本埠市场矣。”正大火柴公司后来成了宁波著名企业。

初夏话河虾

回味

子君

文/摄

初夏，海棠飞尽，枇杷黄熟，栀子花身携暗香盈盈而来。

小河的水流日渐回暖，水底深处蛰伏了一冬的河虾开始浮游轻舞。此时雄虾身肥体壮，雌虾籽满壳软，美味正当时。

浅夏总是令人慵懒，自然得做个浓油赤酱的油爆河虾提提胃口。河虾剪去须爪，先起锅油炸至虾壳酥脆备用，另起底油放入葱段、姜片、蒜片，入炸酥的河虾翻炒几下，放白糖快速翻炒。白糖遇热融化迅速包裹住河虾时，几滴老抽上色、生抽调味。“嗞嗞嗞”间，外脆里嫩、红润发亮、鲜甜可口的油爆河虾上桌。一碟河虾，一杯小酒，一个眼神的交汇，烟火味中滋生出无限小欢喜。

油爆河虾浓油赤酱，吃多了难免生腻。江南水乡巧手的主妇，将河虾灌醉了吃，称为“醉虾”。热辣的白酒注入，晶莹的虾体几近透明。撒点白糖、细盐，抓一撮蒜泥、香菜、姜末，滴几滴麻油、生抽，加盖腌制。一只虾、一群虾，浸润在杂陈五味中，满盘子蹦跶，“噼里啪啦”一阵乱响，如，琵琶声声珠玉落盘。过些许时候，便沉沉睡去，只有微微抖动的虾须和虾爪暗示着它们已经醉了。

汪曾祺写醉虾，“我们家乡的吃虾是用酒把白虾醉死了的。解放前杭州楼外楼吃虾，是酒醉不待其死，活虾盛于大盘中，上覆大碗，上桌揭碗，虾蹦得满桌，客人捉而食之。用广东话说，这才真是生猛。”

白酒河虾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经验丰富的老食客，只需舌尖轻轻舔舐，嫩滑香甜的虾肉不知从何处便被吸入唇齿之间，余下完整透明的虾壳，轻轻躬身于盘上，依然栩栩如生。

有一次，无意间在网上看到齐白石的《虾趣图》，画中之虾



油爆河虾。

形态各异，或栖息于荷下水草，或成群结队水中嬉戏悠游，触须似动非动，欲从纸上跃跃而出。定然是齐老一边喝着酒，一边画着虾，酒液顺着他长长的白胡须滴入墨中。微蘸的墨色沾染群尖，忽浓忽淡间，经灵纤细的群虾游弋于纸上。

也许，醉虾，醉它是酒，齐老画中的虾，醉它的是墨吧。

宋代文人林洪的《山家清供》里极其推崇“傍林鲜”：初夏山间挖笋人，会在林边支起小炉子，煮笋尝鲜，图的是山野的清气，使的是一股子性情。

无独有偶，楼下的小河边不知何时新增了一个垂钓者。每每于傍晚之际，携一把矮凳，一只小炉，还有一瓶小酒，于草坪上铺开摆放。待河虾上钩，拉竿、取下，抛入锅中余烫。只几秒间，河虾便脸红耳赤，缩成一团。垂钓者剥壳取肉，下酒，动作麻利，一气呵成。恣意江河湖海间的豪情，绕过弯弯的小河，一路飞扬。

这一幕看得先生眼红手痒，文质彬彬的他，开始起早贪黑、日晒雨淋地加入了垂钓者的行列。虽然因为痴迷钓虾屡遭白眼，家中的一日三餐却也多了几分活色生香。三鲜汤里，碧绿的青菜、橙黄的蛋饺间夹着几只红艳艳的白灼河虾，因闷热天气被压抑的食欲豁然开启；丝缕分明的阳春面上，浇一勺油爆河虾，倍添鲜香；端上洁白如玉的龙井虾仁，清新的气息迎面而来……初夏的河虾，一咏三叹，余味无穷。

初夏，与一只河虾邂逅，寻常的日子，便多了几分小情趣、小滋味。

父亲的扁担

慢时光

俞亚素

它是一根扁担，一根上了岁数的扁担。我不记得它原来的容貌是怎样的，眼前的它已被岁月染成了褐黄色，表面也布满裂痕与斑点。

此刻，它正斜斜地靠在杂物间的墙角，在昏暗的光线里，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。如同我的父亲。

扁担曾经是父亲的扁担，我们家就父亲常用扁担。母亲偶尔也用，但毕竟是女人家，很少挑东西，顶多和父亲，或者和我们姐妹仨其中一个，用扁担抬一下东西。我就曾和母亲抬过一筐白菜，尽管母亲已经将装着白菜的箩筐往她自己一边移，我稚嫩的肩头依然无法承受扁担的压迫。不得已，我用两只手托着扁担，好使肩头少受点力，谁知手又累得不行。

父母很疼爱我们，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让我们姐妹去干粗活，包括抬东西。于是，扁担成了父亲一个人的扁担。那时的父亲，年轻、高大、健壮，就像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，身上蕴藏着无穷的力量。那些年，他用扁担为我们一家人挑起一筐筐粮食，挑起一捆捆柴禾，也挑起一道道生活的坎坷。

说起来，父亲和扁担的缘分还真不浅。

那一年，他20岁，想走出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犹如一只孵了很久蛋的，终于破壳而出。他环顾了一下家里的角落角落，最终选择带一根扁担出门。这一走便是远方。50年后，他依然记得那一天是个春光明媚的好日子，他早上出发，翻山、越岭、渡江、步行，傍晚时分来到我母亲当时居住的海边小镇。那天晚上，他睡在一个废弃的砖窑里。第二天，他扛着扁担在街上溜达一圈，心中立刻有了主意。不久，小镇上便多了一个挑着海鲜叫卖的小伙子。在小镇待久了，小镇上的人也渐渐熟识了他，知道他是哪里人，知道他家有几口人，也知



- ① 燧生自行车与正大童车商标对比。
- ② 不同历史时期的童车商标。
- ③ 正大火柴厂部分商标。

乡愁

蔡体冕

那天上午，在宁波书城，周围都是书，透过玻璃窗对岸望，一些老房子在阳光下显得很亮，那熟悉的轮廓线还是最初看的样子，儿时的印象总是刻在记忆里。从前的客运码头候船大楼改建成了美术馆，有一次，我特意进去转了一圈，旅人来来往往的足迹还留在这里吗？这里曾经是有情感有故事的。这个地方，我们从前都叫它“江北岸”，这三个字，叫惯了。

过去，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上船，经过一夜的航行，一般不会说“宁波到了”，多数人称“江北岸到了”。乘船去上海，也称“在江北岸上船”。那时，开船时间是随潮汐变化而定的，倘若十六铺码头午后三点钟开船，次日将近江北岸时，天还未亮，远望老江桥，一片银白，弯如月牙。轮船靠近码头后，有一两只小木船摇着橹过来，轮船上的水手在船尾将绳抛向小木船，下面的人接住绳，然后将小木船推向岸边。待船停妥，大家陆续下舷梯，踏上码头。

有些旅客的目的地在宁波城里，就提着行李直接出码头了。如

对岸那个地方叫江北岸

那天住潘火桥去的，新河头的航船埠头那里还关着门，只好与祖父母等长辈坐在候船大厅里。候船大厅里灯火通明，很有人情味的。等待天亮的旅客不少，大家坐在一起就搭话了。有的是住宁海、奉化的，有的是镇海、慈溪的，再远一些是家住象山，外面三轮车的喇叭声，时时近地地传来。

我望着对岸，好像就是眼前的事。1968年5月3日，我与祖父母将潘火桥老家收拾干净，锁上门，准备返回上海。这天上午，到了江北岸轮船码头，候船室门口黑板上写着：工农兵三号轮因故障，下午四时开船时间延后。一些人看了告示后，退了票转去火城南站了。住在城里的人也暂时回家了。我们就坐在候船室里等待。午后，不少从乡下上来的旅客，见此通告，也进入候船室等待开船消息。

到了上半夜，祖父靠着旅行袋在长椅上躺下，这年他90岁了。旁边一位东北口音的中年旅客，看到祖父躺在长椅上，忙从旅行袋里拿出一条毯子要给祖父盖身子，十

分热忱，举止彬彬有礼。我不时地走到候船室靠近码头的一边去看，玻璃窗开着，客轮的船尾那里，正在抢修，灯光照得如同白昼。看了几次，我跟祖父说，听到船上有有机声，可能修好了。祖父说，船即停着，也要发电的。祖父从前是海员，当然熟悉船上的事。

在候船室过了一夜，晨间仍无轮船修复的消息，又有一些旅客挑着行李离开候船室。好在天气晴朗，初夏时节，江北岸那里的街上，树叶一片翠绿。那时我十几岁，喜欢玩，午后说去江北岸走走，沿着塘河石板路，不觉又走到潘火桥去了。来到祖父的弟弟家里，我叫我“小阿爷”。他见我一惊，说怎么没去上海。我将码头上的事说了。他即与我一同再沿塘河边走回去，走过老江桥，见工农兵三号轮还泊在江北岸码头。

进候船室，祖父母见我与小阿爷一同来了，亦感突然。小阿爷说，阿永阿婶就住在江北岸中马路，可去她家。说着就走，果真不远，数十步路，就到那条弄堂了。

她家在弄堂里端，一共三层楼。她与祖父母是同事，相晤十分亲切。她的儿子蔡同华先生下班来了，我叫我伯伯。他对我祖父母十分敬重。儿时常听长辈说起他的故事，他在抗战初期参加了新四军，宁波解放那年，他一身戎装到潘火桥看望过我祖父母。此后一别将近20年没碰面，想不到由此机缘重聚叙旧。在他家住了两天后，上海开来“工农兵十八号”轮，接滞留旅客回沪。我和祖父母与他们一家依依惜别。

在江北岸码头送客亦是过去常见的景象。送客者站在堤岸上，朝立在轮船舱外长廊上的亲友挥手，一些年纪稍大的阿姨拿出手绢来向上扬，喊着话，叫着称呼，叮嘱着。那时，信来信往，有一年才相会，有的或要数年才见面。叫着，叫着，眼眶也红了。有的相互握手，说：“回去吧，回去吧！”更觉情义绵绵。船开了，汽笛声也响了几遍。船渐渐远了，码头上的送客者才慢慢地转过身去。

我望着对岸。对岸那个地方叫江北岸，好像是一本看不完的书。